“地势”与人类学的日常语言视角 和方法

社会
2025·2
CJS
第45卷

朱晓阳

摘要：本文从政治人类学的发问：“不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政治学’何以可能”出发，提出政治生活中的“势”话说蕴含着其他选择途径之观点，进而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入手讨论“势说”政治进路。本文在讨论理解“势说”政治的关键——日常语言视角论时，受到当代语言人类学和视角论人类学的启示，并特别以当代语言人类学的田野发现和文学翻译的“田野”经验作为支持。基于语言现象学所秉持的反还原论预设，本文将“地势”视为由一些相异成分以“中间链接”而成的“一般图景”，并在最后部分对“地势”作为实地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虽然“势说”政治或“地势”话说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本预设上有所区别，但是在田野调查技术层面，两种范式是相互兼容的。基于此，本文以测度方法为例，对“地势”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地势 政治人类学 日常语言视角 一目了然/综观演示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5.02.008

***Dishi* and the Everyday Languag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in Anthropology**

ZHU Xiaoyang

Abstract: In political practices related to space, phrases such as “considering *dishi*” (考量地势) and “grasping *dishi*” (把握地势) are frequently employed by practitioners. The concept of *dishi* (地势, terrain) also serves as one of the expressions with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shishuo*” (势说, strategic positioning).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such everyday political language to discuss *dishi*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It starts with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ical question of “how is ‘political science’ possible without taking the West as its departure? ”, suggesting that the discourse of

* 作者：朱晓阳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ZHU Xiaoyang,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zhuxiaoyang@pku.edu.cn

shishuo (势说) embedded in political life offers alternative pathways. By adopting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rooted in everyday language, this study goes on to examine the political approach of *shishuo*, contrasting it with fundamental issues in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causal inference. The discussion of key elements in understanding *shishuo*--particularly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anguage--draws inspiration from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supported by ethnographic findings i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fieldwork” experienc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tudy, grounded in the anti-reductionist premises of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conceptualizes *dishi* as a “general picture” formed by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through “intermediary links”. It further argues that discourses of *dishi* often function as performative acts rather than descriptions of preexisting facts or conditions in the causal-inferential sense. In anthropological interventions, the discourse of *shishuo* and action are intertwined, rendering such discursive practices themselves methods for studying *dishi*. The final section explores *dishi* as a field research methodology. While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shishuo* differ from those of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these paradigms--and even multiple paradigms--are mutually compatible at the level of fieldwork. Using mapping method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n addition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shi*-based approaches.

Keywords: *dishi* (地势), political anthropology, everyday language perspective,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一、不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政治人类学何以可能

“考量地势”“了解地势”或“掌握地势”是政治实践的日常用语。特别是在与空间有关的政治实践中，“地势”是当事者或旁观者常常挂在嘴边的词。用日常语言来说，“地势”属于“势说”政治的表述之一。笔者在 21 世纪初的城市更新和改造中感受到“地势”作为方法之重要性，开始思考其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并撰文讨论过“地势”在政治人类学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参见朱晓阳, 2016)。本文试图将“地势”问题放在更宽泛的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进行讨论,因而需要从一些根本性问题开始论述。

“如何不以西方作为出发点”是 20 世纪末政治人类学学者提出的一个大问题(Gledhill, 2000: 8)。类似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人类

学研究中。21世纪出现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¹也隐含着这种问题意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但近年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仍与以上问题相关,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地方化”或文化自觉主张。

在理论上,这一问题可以如此表述:不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概念或视角来论说非西方社会及政治如何可能?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案例《非洲的政治制度》(福蒂斯、埃文思-普利查德,2016;Gledhill, 2000)是以韦伯式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概念来界定非洲政治制度,那么不以这种西方政治社会学框架为出发点可能吗?“权力”是否为讨论非西方政治的必要概念?人类学家萨林斯批评道,西方式人性幻象及政治构想以“性恶”和“等级或平等”“君权或共和”为预设,²我们应该展望一种不同于西方式人性幻象的政治研究图景。在实践中,该问题则指不以西方政治和西方式民主制度等为归途如何可能。

就政治人类学的进路/方法论而言,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在“结构—能动性”“说明—理解”或“经验性—诠释性”等二分进路和方法论之外是否有更多可能性。政治人类学学科史中的几种主流进路就是以此为界线的,例如《非洲的政治制度》属于结构性进路,《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则属于能动性的一端。政治人类学的二分进路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情况。这些二分也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或哲学中,例如,自然逻辑空间(因果律原则)和理由逻辑空间(理性原则)二分的预设。因此,上文提到的问题又可替换成:因果律原则—合理性原则二分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是否必要?³

1. 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讨论较多,这里仅列举几篇综述性文章: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Kohn, 2015; Paleček and Risjord, 2013; Salmond, 2014; 朱晓阳, 2021b。

2. 萨林斯(2008: 100)的批评具体如下:“两千多年来,我们所指的‘西方人’一直被自身内在本性的幽灵困扰着:人性的幽灵如此贪婪,充满争议,若不加以某种控制,它会使社会陷入混乱。在对付这个难以驯服的动物时,政治科学采取了两种对立的和轮替的手段:等级或平等,君权或共和——它要么是一个宰制体系,凭借外力(理想地)约束人们的自利天性;要么就是一个自由、平等之权力的自为体系(理想地)将人们的特殊利益融于公共利益之中”。

3. 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8)的“经验—解释—批判”进路很接近本文的主张,但他是在另一种语言述说视角之下提出的。在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方面,伯恩斯坦的《社会理论的重构》(*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是一本很重要的著述。思想史学者、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昆汀·斯金纳(Skinner, 1979)认为,任何想(转下页)

以二分方式来概括和评述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进路依据的有理查德·伯恩斯坦、安东尼·吉登斯、布迪厄等学者。这几位西方学者都试图克服二分进路,例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8: 235)在《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中对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进路之述评值得特别提出。他以经验性—分析性、历史性—诠释性(包括诠释/理解社会学和现象学)的二分作为概括,然后于这些二分之外提出以哈贝马斯式交往行动理论和批判理论为第三种进路。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理论应当是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势说”政治获得了另一种进路/方法论选择的可能性。

所谓“势说”政治,是指以“势”的话说为进路的政治生活形式。汉语经典文献或日常语言中存在诸多关于“势说”政治的论述,从《韩非子》《孙子兵法》《荀子》《老子》《孟子》到清代王夫之的学说和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等里面都有相关内容。例如,《老子》中提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周易》则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⁴纵观从古至今“势”(包括“地势”)的话说,典籍与民间日常话语的表述并不违和,对“势”的言说基本在常识常理的范围之内。以上列举的几种文献虽然跨越千年,但“势”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贯的。就本文而言,“势”的话说的意义主要是在实践或方法层面。当然,20世纪确实有学者另辟蹊径进行讨论,他们主要试图在中西思想对话下展开对“势”的论说。20世纪至今,关于“势说”(不仅是政治)的论述,可举金岳霖的《论道》。书中强调“势”是殊相或“实在”,相当于一种整体的“变”和“动”的原则,“它是变底原则,动底原则,这川流不息的世界底基本原则”(金岳霖,2010: 197)。金岳霖(2010: 13-14)认为自己的“实在论底知识论”既不唯心,也

(接上页)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超越社会学科的深刻变化的人都应该阅读伯恩斯坦的书。他还称赞伯恩斯坦以最谨慎的态度审视了极其广泛的理论,对每种进路都增加了一系列极具洞察力的批评。此外,对本文颇具启发的还包括:约翰·麦克道威尔《心与世界》中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区分以及关于无疆界的讨论(McDowell, 1994),唐纳德·戴维森在《论心理事件》中对于变异一元论的讨论(Davidson, 1992),希拉里·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崩溃》(Putnam, 2002)以及一些哲学家的相关讨论。

4. “坤”取其本义为“顺”。“地势”与地形有别,王弼注:“地形不顺,其势顺”。有说法称“地势坤”为以地之形势喻坤顺,东汉经学家宋衷说:“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黄寿祺、张善文,2008: 18)。

不唯物,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⁵“势无必至”,“势”不再如(经验归纳的)因果论那样寻找每一事件的“因”或受困于“例外”。

本文将“地势”视为与“势”论说有深刻关联的现象,但所讨论的人类学方法论主要与有形之物相关,因此将“地势”抽取出来作为聚焦性概念。⁶

如果要从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举一个有关“地势”考量的案例,那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地势”论说十分恰当。

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 (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 (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毛泽东,1951:56-59)

如果仅从军事或战争着眼,自古以来,地势分析就是重要的方法或兵法,古人和今人对此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⁷应当指出,这些关涉

5. 金岳霖将“势”同时当作“殊相”和“原则”,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前者是具体的东西,后者则是抽象的。本文匿名评审之一提出,“如何在否认这两层/两端的(不同意义的)实在性的前提下,说明‘地势’实在性是第三种实在性,例如,若把 particulars/殊相理解成已具现象(知觉)解决,则其相对于物理/地理这一端和相对于个体主观心理这一端的‘中间链接’地位如何不同于语句内容的非心理(反还原于个人心理)客观语义?”本文认为,如果从汉语视角的“势”来把握,则可以在已经蕴含否认这两层/两端的(不同意义的)前提下,说明“地势”之实在性,并不需要诉诸心理层面去寻找第三种现实。

6. 选择“地势”作为焦点与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物本体为一个重点有关,就此而言,本文是在与本体论人类学对话。

7. 例如,陈寅恪(2011:236-320)在对唐代几次政治事变的研究中,特别分析过长安玄武门地势的决定作用。这是今人以“地势”作为方法分析古代政治和兵事的一个范例。此外,钱穆(1996:531-533)关于北宋都城地势的分析也是一例。

“地势”的论说,包括毛泽东论说的“地势”与其他条件的关联,不是传统社会科学命题(逻辑)式的真或伪,也不像社会人类学中的“topography”(地志)或“morphology”(形态学)那样是有确定指涉的地形、“地点”(place)或物质/生物“形态”(毛斯,2003:394)。“地势”与社会科学的因果逻辑条件之间也不能互相化约。⁸同时,从依据这种地势把握所采取的行动之后果来看,毛泽东对于地势意义的理解是合适的,但对于这种“地势”论说或话说,我们只能从日常语言的语义和语用理解。

当今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势”做过精当分析者,当属法国学者余莲。他认为,“势”是与西方逻辑斯中心的哲学相反的非“本体”的公设。⁹余莲眼中的“势说”更接近孙子兵法式的兵法之势。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以西方哲学为坐标,对中国思想抱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认为中国无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传统,却存在一种另类的智慧。

“势说”政治似乎能够克服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二元区分格局,即不再要么强调政治主体(能动性/行动者/自由意志),要么强调系统(结构/决定论/机械论)。但如何既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路及方法论对话,又立足中国的话语实践和生活形式,将“势说”作为政治研究的进路和方法论说清楚?本文认为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是一种选择。

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受到日常语言哲学及其最近发展的影响而出

8. 相互不能化约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不能互相兼容,相反,两者可以“凑合”或以中间联系的方式一起对历史进行解释。后文将以具体方法来展开说明这一观点。对此,可以参见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因果联系(发展假设形式)解释历史只是对数据的一种概括安排,历史解释也可以将数据收集成一个总体图景,而无需以有关时间发展的假设之形式去做。维特根斯坦强调,应当以“综观/一目了然式演示”(perspicuous presentation)去展现现象间的“联系”(connections),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发现其中间链接(Wittgenstein, 2018: 46-48)。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对于本文以日常语言的“地势”来讨论政治人类学方法是一个重要启示。此外,从人文社会科学实证科学的不同立场出发,彼特·温奇(2016: 70)也认为历史“趋势”(trends)的预言不适合采用基于初始参照条件的因果推断。同样从(维特根斯坦式)语言哲学传统出发的洛奇(Andrew Reginald Louch)也认为,因果说明不适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关于我们可以被认为观察到什么,即因果说明依赖时间上连续的重复观察,这种看法主要衍生自一种原子论的观点”(Bernstein, 1978: 75)。

9. 余莲(2009: 210)的具体表述如下:“中国人通过客观运作之中的趋势,便能见到眼不可见的事物,这是为何中国人不需要一个变成‘肉身’的媒介,也不需要‘形而上学的公设’”。

现。分析哲学领域近年出现了基于奥斯汀语言现象学¹⁰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跨语言现象学”，这一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整合性分析的哲学研究取向，其代表是英国学者毕明安(Michael Beaney)。毕明安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语言现象学与庄子哲学一样都是“视角论”哲学。¹¹按照毕明安的跨语言现象学观点，“类比位于中国思维的核心”(Beaney, 2024)。¹²这种思维形式与维特根斯坦关于 seeing as(看作)的观点接近。这种日常语言哲学下的视角论为本文提供了“看”地势的一条新思路，有助于将“地势”视为因果联系之外的一种“一般图像”(Wittgenstein, 2018: 46)。更重要的是，这种进路主张中国古典思想(庄子、墨子)同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奥斯汀语言现象学是一样的哲学，对于重新思考中国思想与20世纪西方哲学有深刻意义。跨语言现象学还主张“对当代认识论提出极为必要的批判”，特别是对那种带有“形而上学包袱”及“命题和(相应的)事实”的认识论进行批判(Beaney, 2024)。毕明安(Beaney, 2024)认为，“这表明了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在当今的相关性，在欧洲，我们终于意识到了其他哲学传统的存在。这深化了我们对其中一种尤其重要的传统之认识，使我们能够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来加以了解”。

下文将从“势说”政治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进路和作为方法的“地势”等两部分进行讨论。总而言之，本文将从语言现象学视角把握

10. 这个术语最初是奥斯汀(Austin, 1956: 8)在《为辩解一辩》(A Plea for Excuse)一文中使用的。

11. 毕明安的具体表述如下：“在《在中国逻辑中快乐畅游》(2021年)一文中，我提出中国古代墨家的根本认知观念是‘作为……而知道’，这一观念与道家重要文献《庄子》中的关联性视角主义(connective perspectivism)非常契合。在本文中，我想通过借鉴维特根斯坦对‘看作’(seeing as)以及‘样本’(samples)逻辑的讨论，并发展‘看作’与‘作为……而知道’(knowing as)之间的类比来进一步探索这一观念。维特根斯坦在原本被称为《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中的关于‘看作’的论述本身就是探索性的。”(Beaney, 2024)

12. 对于汉语思维的类比性，国内哲学领域早有论及，如尚杰(2010: 45-49)在《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中提出纵向逻辑与横向逻辑之分，“前者指的是一种深度思维传统，对立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什么是我所谓‘横向的逻辑’，它的意思不是对立统一，而是与系统元素之外的别一元素建立关系，它不是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对称有点像‘精神分裂’‘蝴蝶效应’，或者‘亦此亦彼’的量子力学精神，是‘没有关系’的关系、微观领域里的折叠效应”。

“地势”，将“地势”作为非还原的“中间联系”条件和“以言行事”来加以把握，并在测度“地势”时秉持一览无遗的眼光。

二、“势说”政治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

本文所谈的“势说”进路与阐释人类学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有相合之处，即二者都关注社会话语和关键象征，并将之视为理解政治的开始。但阐释人类学是将地方社会话语(其实是关键象征)套入韦伯式理解社会学的阐释框架中，带有还原论的影子，¹³而本文所指的“势说”则要从以“关键象征”入手的格尔兹式文化解释转向从日常语言述说视角出发的政治研究。¹⁴这是理解“势说”政治，特别是将“地势”作为历史解释之明显概念的关键。

(一)何为“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

笔者曾对“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下过定义：“如对地势为核心概念的人类学本体论下定义，可以将之称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它在关于‘实在’的看法上与实在论语言哲学一致，但也有一些差别。差异之处在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在认可语言之间有翻译可能的‘彻底解释’前提下，将不同语言的述说视为他者性的生活形式或‘视角’”(朱晓阳，2020)。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主张，文化(语言)之间可以互相理解/翻译，进而消除反思人类学的“表征危机论”。它强调不同语言的述说视角差异，由此导向了实在/本体相对论。以本文所讨论的“地势”

13. 格尔兹的“厚描”认为，同一世界，不同世界“版本”(看法, versions)。这是阐释人类学的自然主义前提。就此而言，厚描与语言分析哲学家戴维森所主张的“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之间有内在契合，两者都赞成“文化持有者”的世界可理解、可翻译，并且理解或翻译的起点都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同样事件和客体”。如果站在本文的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立场看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可以发现他没有考虑述说一视角(其用语为“法律感知”)的本体差异性(Geertz, 1983: 55-70)。

14. 如果用维特根斯坦关于历史解释应当是“综观/一目了然演示”和寻找异质成分的“中间链接”之说法，本文与人类学所说的“厚描”则有相当距离。格尔兹的“厚描”虽然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现象学的影响，但就其论说及使用情况来看，仍存在一种还原论的倾向。例如，他关于尼加拉剧场国家的研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剧场国家”模式，并被后续的一些学者模仿使用。然而，格尔茨(Geertz, 1965)对“纪实文本法”的介绍又呈现出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反还原论主张之倾向，在他看来，纪实文本是某一个别事件或现象本身的缩略，而不是某种一般模式的个别现象。罗杰·基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格尔茨曾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比喻——语言像古城(Keesing, 1974: 80)。

为例,其作为日常语言虽然可以与西方社会科学的 topography(地志学)或 morphology(形态学)互相翻译,但实则指向一种汉语述说视角下的“实在”(朱晓阳,2021b)。从日常语言视角,特别是语言现象学视角出发,本文虽然赞同“地势”不是一种还原论意义上的本体,但并不怀疑“地势”的实在性。

论证日常语言述说视角与现实或实在的关系,较方便和直接的方式是使用哲学成果。“视角论”在哲学领域为人所熟悉,在当代仍然有哲学学人对视角论进行拓展(如 Giere, 2006; Paleček and Risjord, 2012),还有人以“关联视角论”(connective perspectivism)解释庄子的相对主义(如 Beaney, 2021)。更早的视角论可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为例。在《哲学研究》第 74 节,维特根斯坦以立方体示意图为例,表示视角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或生活形式。¹⁵ 维特根斯坦的例子简洁有力,使人对于视角论立刻就有直观感受。与此相仿,海德格尔(2018, 2004)晚期以德国方言诗人的作品为例,讨论其核心概念 Ereignis(可译作“本有”“居有”或“大道”等),也直接支持了本文关于不同语言述说有本体差异的主张。海德格尔(2018: 146)指出,在同一语言(德语)下,“不仅所有土话是不可译的,而且任何纯正的语言都是不可译的”。海德格尔(2004)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特别是对方言诗的论述比较接近本文的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再如唐纳德·戴维森关于“心理事件”的讨论与本文不仅内容直接相关,而且其语言分析方式可供本文直接借鉴。戴维森的问题意识来自康德关于“自由意志决定与必然律支配间不应当存在矛盾”的判断,它正好对应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即自然逻辑空间—理由逻辑空间之二分,也隐藏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动力。戴维森发现,被归因于人的自由、愿望或意志的心理事件,往往也是为因果律决定的物理事件,在此预设条件下,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是同一的,虽然前者是依据人的意向性和理性作出的因果描述,后者则是依据自然因果律所作的描述(Davidson, 1992)。他进一步论证,对两种事件的描述不能互相还原,即没有严格的心理—物理规律,但两种事件同

15. 维特根斯坦(2018: 74)指出,“将一个立方体的示意图看成由一个正方形和两个菱形构成的平面图形的人或许会以不同于立体地看这幅图像的人的方式来执行命令‘请给我拿来这样的某种东西’”。《哲学研究》中关于视角论的讨论还有很多,如著名的“鸭兔子头”图像及相关讨论(Wittgenstein, 2009: 204)。

一,并且可以在变异一元论之下解释。¹⁶

本文认为,戴维森实际上讨论的是同一语言(英语)下的“视角差异”。如果将他关于心理事件的讨论换成预设两种语言视角差异下的情景,那么几乎可以直接用于推论本文的跨语言述说视角差异。之所以说“几乎可以”,是因为戴维森的立场与其关于彻底解释的讨论一致,本意是要摒弃相对论而不是本文所主张的不同语言述说视角具有实在或生活形式差异性。实际上,哲学界也有人认为戴维森的哲学“在人际或跨文化的意义上给前者(心理事件)留下了足够客观的‘范式/诠释相对主义’空间”。¹⁷

虽然既有的哲学成果能提供有力的分析和论证,但就本文内容而言,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人类学对于“语言述说视角差异的实在相对论”的基本预设,更主要得益于当代语言人类学、人类学视角论和文学翻译的启示。

首先是文化人类学中语言相对主义传统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一般都会提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即主张思维与语言同构的文化相对论(穆尔,2009:102-118)。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被哲学家当作文化范式之间不可通约的案例而批驳过(参见 Davidson,2001:183-198),但萨丕尔(2011:47-62)关于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或语言作为有差异“形式原则”会制约人之行为的主张,则在当代语言人类学中有持续影响。¹⁸当代语言人类学界中有人提出语言述说与环境或生活形式同构,即指向实在论意义上的差异,并认为我们的声音结构也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制约。¹⁹一些语言人类学者基于田野工作的报告支持这种主

16. 关于“变异一元论”,可见戴维森《心理事件》(Mental Events)一文(Davidson,1992:137-150)。

17. 这里转述本文的匿名评审之一的意见:“对戴维森的反常一元论的批评,不应当过于偏重其反相对主义那一面。其实,他所强调的心理类型相对于物理类型的不可还原性,在人际或跨文化的意义上给前者留下了足够客观的‘范式/诠释相对主义’空间。当我们考虑到戴维森对所谓经验主义第三教条(如共同的经验内容与不同的概念图式)的拒斥时,已然看到某种整体论全球性(global)框架内地方相对主义(local relativism)的动态兼容/调和性”。此外,帕莱切克和里斯约德(Palčėk and Risjord,2013:3-23)在用戴维森哲学讨论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时也有相似地发现。

18. 沃尔夫(2012:278-279)认为,“在语言和心理现象中,有意义的行为(或者说相互联系的行为与意义)受制于特定的系统或组织结构,即每种语言特有的形式原则‘几何’”。

19. 埃弗里特(2020:245)认为,“声音结构可能会受到语言产生的环境条件(转下页)

张,如埃文斯发现了“话”(words)与“土地”的直接关联,即澳大利亚北部土著语言中的词汇经常显示特定植物和动物物种之间的生态联系。²⁰

阿纳姆地的几种土著语言中关于巨足类动物(即袋鼠和小袋鼠)跳跃的词与英文同义词之间存在可比较的差异。英语将所有对此的描述工作都加载到名词“kangaroo hops”(大袋鼠跳跃)和“wallaby hops”(小袋鼠跳跃)等之上,但昆温库语中有不同的动词来描述这些不同的巨足类动物的跳跃:“kamawudme”用于雄性小袋鼠的跳跃,“kadjalwahme”用于同类的雌性跳跃,如“kanjedjme”用于小袋鼠的跳跃,“kamurlbardme”用于黑色小袋鼠的跳跃,“kalurlhlurlme”用于敏捷小袋鼠的跳跃,等等。这些词汇聚焦于通过步态特征识别巨足类动物,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在狩猎时从远处识别此类动物的主要方式。²¹

(接上页)(平均温度、湿度、大气压力等)的明显限制。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忽略了这些联系,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清楚地确立了这些联系。因此,要理解特定语言的演变,必须了解其原始文化和生态环境。没有哪种语言是一个孤岛”。埃弗里特(2019)关于亚马孙皮拉罕人语言与文化之关系的田野报告亦为一个例证。

20. 埃文斯(Evans, 2010: 22)指出,“在整个阿纳姆地,闪亮的断斑石鲈(spangled grunter)与当地的白苹果树(syzygium eucalyptoides)同名,因为白苹果树的果实会落入小溪和水塘,断斑石鲈会吃这些果实。在昆温库语(kunwinjku,澳洲土著语言之一)中,两者都被称为 bokorn。了解此关联对于任何在这里钓鱼的人都有明显的价值。他们会寻找这种树,因为水中很可能会找到它的鱼‘伴侣’。在中央阿纳姆地的语言中,这种对比比比皆是,使这种树成为该地区名副其实的渔民指南。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它只能以只有几百人使用的鲜为人知的语言而保有,转向另一种语言则可能会切断它的传播。一旦我们将 bokorn 鱼称为‘闪闪发光的石鲈’,将 bokorn 树称为‘白苹果’,我们的话就不再传达它们之间的生态联系了”。

21. 埃文斯(Evans, 2010: 57)称,“这特别有趣,据说最近关于识别巨足动物物种的计算机视觉程序的研究工作也是基于它们的运动而不是静态外观,这使编程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更准确些说,当代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以词向量为基础的“神经网络”(transformer),图像也是按向量编码,利用向量的空间距离进行词汇预测。这种方法令人想到本文的“中间链接”,即一种类比性和相似性思维形式。如果情况如此,我们会对中国思维的关联性视角论的意义和潜力有更深的认识。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辛顿(Geoffrey Hinton)也认为,人类智能的本质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学习”(learning),并且人工智能的学习与人类是一样的,人工智能的学习不仅仅是统计分布和大数据基础上的“随机鹦鹉”,追随乔姆斯基理论而将智能视为逻辑推理的人不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也不理解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辛顿的批评如同毕明安的语言现象学一样,认为命题逻辑和推理并非哲学本质,进而也并非智能的本质,但辛顿不理解在类比、相似、关联等与人工智能学习接近的认识形式背后都有亲知或生活形式,这与人工智能的学习不同(参见“AI教父 Geoffrey Hinton: 数字智能会取代生物智能么?”,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46278278639403561/?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wid=1743893796325)。

其次是当代人类学视角论的本体相对主义。这方面可以巴西学者德·卡斯特罗(De Castro, 2004)的观点为例。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多义性”或“含混性”(equivocation),即共享的“同义词”其实存在多义性。“多义性”出现在不同群体共享“同一文化(语言)”但身处不同世界(自然)的情况下,适用于讨论不同语言翻译成一种共同语言的情景。例如,当亚马孙—安第斯人和其他外来的左翼运动伙伴都使用“land”(土地)一词来交流时,这个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多义的,在左翼人士看来是指“land rights”(地权),在土著人看来则是指“earth-being”(大地之在)(De la Cadena, 2010: 334-370)。在卡斯特罗(De Castro, 2015)看来,这种词义含混“不是单纯的理解失败,……它与对待世界的想像方式无关,而与被看见的真实世界有关”,因此翻译是为了显露差异,而人类学民族志应强调“民族志差异”(difference)或“他者性”(alterity)。日常语言视角论更进一步认为,身处不同世界(自然)的生活形式,会有不同的日常语言述说,特别是“方言”表达。

此外,英国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视角论也较有影响。²² 她以“看”美拉尼西亚人的仪式或日常装饰为例,讨论西方人视角和当地人视角的差异。例如,欧洲艺术摄影者会把当地仪式中盛装人物的头部作为焦点,并将其当作“面具”,关注“面具”所显露或遮蔽的“个人”(person)²³,但往往忽略了人物的其他部分或社会生活(这部分是人类学者所“看”到的)。这种视角将装饰视为个体“认同”的相当物,而当地人的“看”更多着眼于“关系性”。斯特拉森用视角论论证她对于当地人“关系性”(relationality)世界的理解,在这种关系性视角下,个人是可“切分”(divided)的,而非不可分的或个体的(individual),但她的视角论案例分析没有涉及当地语言述说与“视角”之间的联系。²⁴

最后是文学翻译的田野发现,或者说“诗不可译”的田野经验。诗翻译的经验值得重视,是因为其突破了长期以来由哲学家—语言学家以

22. 斯特拉森(Strathern, 2022)认为,“一般而言,考虑到‘看’激活关系(明确地让事物被看到,看到是一种行为)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视角’的交流中添加一些评论。其中,每个表演者和观众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因此从对方的位置来看‘视角’,就像关系一样,是在他们之间‘切分’”,如文艺复兴后出现的透视法支配了西方式观看视角。

23. 按照毛斯(2003: 285-290)的研究,“person”在拉丁语里亦有“面具”之意。

24. 斯特拉森的“关系性”令人想到费孝通(2003)晚年关于中国人的“我”是“不清楚的我”之说。

“理想语言”互相循环论证的格局,直接从语言的跨文化实际运用中发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生活世界的关系。²⁵除了语言人类学的田野报告和哲学家的推断,所谓语言述说视角下的差异性在何处容易发现?答案是在文学特别是在诗中,“诗不好译”的结论在此甚至可改成“诗不可译”。

诗翻译虽然一般能够互相对准并呈现出对方语言“同义词”的基本意思,但无法做到完全形貌对译。²⁶翻译无法呈现诗歌语词的模糊处,无法呈现原诗的声音。而诗歌语言的发声、韵律、节奏是诗的存在本身,更是其词语内容的源泉,是语言通向实际生活的道路,这也是译作与原作基本上不可能互相吻合之处。就汉语而言,诗语言还有象形部分,即由其笔画组成的“身体”,这也不能翻译。因此,“诗不可译”相当于说,诗体现了日常语言述说的视角差异,方言诗则是这种差异性的极致体现。

(二)从日常语言视角出发——“势说”政治与传统社会科学进路的区别

上文从语言人类学、视角论人类学和诗翻译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目的是强调日常语言述说视角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实在”的差异,因此重要的是将“势/地势”作为日常语言述说视角来把握。本文认为,只有

25. 我们常以哲学家的理想语言实验(如戴维森式语言分析哲学)讨论不同文化(语言)范式之间的理解,这类语言哲学家又会借助如乔姆斯基式或结构语言学的深层语法等预设来进行讨论。另一类哲学家,如奥斯汀等声称从语言现象学入手,但也没有跨语言范式翻译的体验。海德格尔倒是曾意识到中文的“道”是不可翻译的,他曾谈到与一个中国人讨论“道”的经验,“在1943—1944年间曾参加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曼尼德斯讲座的一位中国人(即萧师毅)也发现(我所讲的内容)与东方思想有相通之处。在不熟悉其语言之处,我总是保持怀疑的态度。而当这位搞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中国人与我一起翻译老子的一些诗节之后,我就更是怀疑了。通过发问,我知道了这种语言的本性(与西方语言)是何等地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这里有某种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正是对于未来有着根本意义的东西”(参见 May, 1996: 101-102; 张祥龙, 2017: 308)。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74节以立方体示意图为例,表示有不同视角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此外,他关于美学的演讲和晚期关于“确定性”的笔记中有涉及跨语言现象的论述(维特根斯坦, 2024; Wittgenstein, 1967: 30)。而海德格尔(2004)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特别是方言诗的论述,最接近本文所称的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

26. 安乐哲(Roger T. Ames)谈到,诗歌翻译一方面失去了这件作品的诗意(what is lost is the poetry, 此话来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诗”(what is found is also the poetry),也就是说,好的翻译会重新创造诗,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唐诗”(参见胡治洪、丁四新, 2006)。

坚持这一点,才能避免遭到戴维森式反相对主义“彻底解释”之驳斥,才能解决金岳霖的势论所受到的诘难,才能说清楚社会学本土化是否真问题(朱晓阳,2020)。

本文的起点是试图从与当代社会科学传统对话的角度,提出一种不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政治人类学进路。如前所述,无论是金岳霖的势论还是戴维森的心理事件分析都涉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因果论。本节将以日常语言视角的主张讨论其与当代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关系。

笔者曾另文谈到过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对戴维森的超越(朱晓阳,2021b),这里仅讨论金岳霖的势论与因果疑难的问题。金岳霖(2010)认为,其“势无必至”的主张解决了休谟因果推断的根本问题,即不再如(经验归纳的)因果论那样寻找每一事件的“因”或受困于“例外”。但哲学界有人认为,若从当代西方日常语言哲学关于休谟论因果的框架中看,金岳霖的“势无必至”方案已经随着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INUS条件”的提出而有了定论。²⁷“INUS条件”是由哲学家约翰·麦基(Mackie, 1965:12)提出的“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n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condition”的缩写。根据“INUS条件”,所谓“原因”,是使结果出现的“某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

这里与本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因果推断的“INUS条件”能否与“势无必至”相互化约?笔者认为,“势无必至”与“INUS条件”的“视角”有别。如果不从日常语言视角预设“势”是一种实在或生活形式,“势”与“INUS条件”的所指将无甚区别,也可以称“INUS条件”为“势”的同义词。但若坚持“势/地势”作为汉语日常语言视角指向一种差异世界,且不可化约成因果推断或“INUS条件”的生活形式,那么,“势无必至”与“INUS条件”虽为同义词,但却含有歧义或“多义性”。此外,“势”在日常语言视角下是可察看和可把握的“变”,也是“天人合一”天道观的基

27. 以上观点来自与郑宇健的讨论。他认为,“金岳霖的‘势无必至’,若放在休谟论因果这个西方哲学有定论的框架中看,且尽量将‘charitably’与金岳霖所谓既‘整体’又‘殊相’的变之原则相结合,最佳诠释恐怕是:系统中局部变异在相对恒常稳定机制下的‘net outcome’,即它不等于‘chancy variation’本身,但又同时预设着系统规律(‘固然之理’也)和无常例外(‘无必至’也)的具体当下之果或有形呈现”。在金岳霖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对休谟“constant conjunction”的理解深度距今颇远,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就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麦基提出的著名的INUS条件。

本用语。“INUS 条件”作为“原因”是以某种客观条件已然存在为指涉，或有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式视角。与此相关，“势”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行动（以后将论及），“INUS 条件”则不具有此种面向。

简言之，将二者进行比较，正好说明“势/地势”的语言述说与“INUS 条件”之间存在视角差异。换句话说，“势”是与“INUS 条件”存在不同视角的另一种不能互相还原的“规范性描述”。²⁸ 例如，谈论“地势”一般与“气”“道”或“生生”等话语实践相融贯，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或“道生德，畜物形势成”之类的话语。从命题对应事实的逻辑看，在这些话语中，“地势”与其他成分之间更像是类比而非因果关系。此外，在“INUS 条件”下，无论“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n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condition”，还是中译文“某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都不会与以上列举的“势”或“地势”话说相互融贯或还原。

如勉强借用戴维森关于心理事件分析的话语来说，“地势”实在的特征是：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描绘中必须有对于天人合一的天道观、自然观和人观原理的说明。与此不同，“物理实在的一个特征是：物理变化能由那些把这个变化与其他从物理上描述的变化和条件联系起来的规律做出说明”（戴维森，2008：455）。戴维森这里谈到的物理实在正符合“INUS 条件”的特征。他接着对与物理事件同一但互相不能还原的心理事件说道，“心理实在的一个特征是：心理现象的归因必须对个人理智、信念和意向的背景负责任”（Davidson, 1992：146；戴维森，2008：455）。

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机制”作为因果关系的讨论也是与“INUS 条件”相似的因果推断。²⁹ 在经济学领域，因果推断研究在近些年来可谓“显学”。³⁰ 例如，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得者就是以因果推断解决经济政策效果评估问题的。应当指出，经济学的因果推断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统计学进路去解决自休谟以来的因果疑难问题，但无论从日常语言视角论，还是从戴维森论心理事件的意义上说，都不可能解决休

28. “INUS 条件”与“势无必至”的关系可以用戴维森关于心理事件讨论的变异一元论来理解。戴维森（Davidson, 1992：137-150）主张，虽然一些事件相同，但没有严格的心理-物理规律可以对之进行描述。这相当于主张在同一语言中，物理事件规律描述和心理事件描述之间有视角差异，即使二者是同一事件。当然，戴维森以视角论讨论心理事件的用意是论证其“变异一元论”，从根本上是反对二元论或本体相对主义的。

29. 例如政治学领域关于机制的讨论（参见左才，2017：24-31）。

30. 有关因果推断在统计学和应用数学中的发展，可参见丁鹏（2021）的研究。

漠的问题。有些统计学进路的论说虽然注意到金岳霖对休谟因果推断的讨论,但没有意识到其“势说”所蕴含的跨文化/语言视角差异。³¹对于跨文化/语言下的语言视角差异与因果推断描述互相不能还原问题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关于仪式的“历史说明”(historical explanation)无需“发展假设形式”(即因果推断)的观点值得注意。³²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18: 46-48)认为,历史事件图像可以(实际上更经常)由非因果的中间现象联系形成。³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用语言现象学式的“一目了然或综观演示”(perspicuous presentation),“这种综观式(一目了然)演示传达了一种理解,即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联系’。因此,找到中间链接非常重要”。³⁴如果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现象学看待与本文相关的历史说明或政治实践,“势说”或“地势”是可以综观演示的现象。³⁵从这种反还原的综观方法论出发,可以发现与“地势”相关的条件的“中间链接”。例如,毛泽东(1952)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地势”

31. 例如,统计学的进路一般都是基于“平均因果作用”(average causal effect)做出改进或突破,可参见丁鹏(2021)的研究。

32.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18: 46-48)对发展假设(developmental hypothesis)式因果推断表示怀疑,他认为,“就如可以通过将椭圆逐渐转化为圆来说明圆与椭圆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并不是说一个给定的椭圆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从一个圆中产生的(发展假设),而只是为了让我们敏锐地发现形式上的联系。但我也看不出发展假设除了给形式联系包装一层外衣(investiture)之外还有什么”。

33.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18: 46)的“一目了然/综观演示”是对命题逻辑形式的批评,这种演示相当于指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类比、植物图式排列以及蒙太奇式组合等都有与因果推论相当的逻辑形式。这一点在毕明安(Beaney, 2024)从跨语言现象学角度对庄子和墨子逻辑的研究中得到了表明。

34. 关于“综观”和“中间链接”的定义,可参见《“一目了然”看世界——“综观”进路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朱晓阳、林叶, 2025)。简言之,“一目了然/综观演示”就是一些互相不能还原的成分的组合呈现。所谓“成分”组合是指由文字和图像组成的复杂模式,包括“以发展假设形式表示的定律、想法”和“类似植物的图式”等。成分之间的联系就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18: 46-48)所说的中间性链接,“因此,找到中间链接非常重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假设的链接除了引起人们对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即(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注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35. 毕明安发现,维特根斯坦的“seeing as”或“一目了然演示”直接指向将当代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作为(并非比较哲学意义上)整合哲学的问题核心。他从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进路出发,结合维特根斯坦的“seeing as”来讨论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庄子和墨子哲学)中的“知”(knowing as)的哲学意义,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现象学和庄子哲学都有一种“关联性视角论”(connective perspectivism)。墨子和庄子的逻辑具有“类(转下页)

进行分析时列举了诸多条件,包括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和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这些条件的关系不需要被视为因果联系,而是相似现象列举或中间性联系。

就此而言,“地势”应该被看作是由一些中间性现象联系而成的一般图景。政治领域在谈论“地势”的时候,不是指地缘政治³⁶所说的“地缘”(geopolitics),即像有机体一样的实体,或具有政治还原色彩的实在,而是一些相互“凑合”³⁷在一起的变动的条件,对“地势”的研判取决于人的视角、行动和“以言行事”的言说。因此,对“地势”的把握是一种“社会诗学”³⁸。

当金岳霖说“势”是“变底原则,动底原则,这川流不息的世界底基本原则”时,仍然有一种还原论的倾向。实际上,人在实践中谈论“地势”的时候,基本上是采用类比的方式。这和命题逻辑所指的真/假不一样,英国学者毕明安(Beaney, 2024)对于这种类比认识形式的哲学意义有充分的讨论。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Descola, 2013: 112)在《超越自

(接上页)比性”“相似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与维特根斯坦的“一目了然”和“seeing as”相当的“knowing as”。从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意义上说,“因果概推”这种命题逻辑是在生活世界之上搭建起的一座“纸房子”,而在日常语言的世界,语言也像汉语一样,并没有一座与命题逻辑相当的纸房子。按照毕明安的关联性视角论,汉语的“地势”从日常语言使用角度来说,也没有命题逻辑那种因果预设。现在的突破是可以把它和西语的日常语言那样一种语言现象放在一起讨论。对当下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平均因果作用说而言,虽然因果关系是按概率随机出现的,但其背景是一种规范性视野的整体论,在这种整体论下,因果关系是一种“回溯必然性”(郑宇健, 2024; Beaney, 2024)。

36. 一般认为,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是地缘政治的开创者。他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后又发表了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拉采尔也是人类学德奥传播论的鼻祖。最初的地缘政治说以“帝国地缘政治”的形式出现,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国家所用的体现。这种地缘政治结合的观念包括永久国族竞争、国家扩张需要、环境决定论和关于文明的种族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引导了欧洲列强以及美国的治国之道。关于地缘政治定义及其复杂多样的变体,可参见Kitchin and Rogers, 2013。

37. “凑合”与朱熹(1986: 975)所说的“物事凑合”意思相似,“恐人说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见道,其实这许多物事凑合起来,便都是道之体”。

38. “社会诗学”是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提出的概念,是指一种日常生活的言语和社会实践方式及其展示的策略(social performance),除了具备在外显与内隐的张力中寻求自我展示的能力之外,还具备将当下的社会生活嵌入过去的经验之中的能力。“社会诗学”因此是人们试图将稍纵即逝的优势(transient advantage)转变为一种永恒的条件(permanent condition)的策略(刘珩, 2019)。

然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四种本体论图式,其中一种即类比。³⁹毕明安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中国的传统认识论形式有类比的特征,类比并不是进化论阶梯上的一级。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非历史发展假设的认识形式也具有类比形式,是以“一目了然/综观”的方式去演示的。⁴⁰

总之,说清楚“势说”政治作为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的人类学,能消除当代社会科学的机制/因果论能否化约“势说”政治的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学近年争论的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找到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三)传统社会科学进路遮蔽下的“地势”政治

以“地势”为进路的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在与传统社会科学进路相对接或互译时,直接遇到的是“结构—能动性”,或如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8: 235)所称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社会政治理论”。本节将对地势进路与传统社会科学进路的关系进行解释,并在厘清这些关系的同时对地势进路作更具体的解释。

从文字字源观之,“势”从“力”,从“執”;其偏旁“丸”最初有种植之意,⁴¹而“壘”(lù)则是土块之意。由此来看,“势”与“地”的关系很紧密。当然“势/地势”也一定与“道”和“气”等相关。笔者曾对“地势”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含义进行如下界定:“地势”一词在汉语中有“地理形势”和“社会地位”之双重含义,指人类/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于人及事(包括社会地位)之变迁有影响的地理形势(朱晓阳, 2016: 4)。本文更强调应当从日常语言视角来理解“地势”一词,即地势是一种汉语述说视角的“实在/本体”和一般图景,也是一种言语行动或以言行事。

除了上述原因,“地势”在理解社会政治生活中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地势问题一般都被传统社会科学问题及其视角所遮蔽。“空间”或社

39. 追随德斯科拉(Descola, 2013: 366)的观点:“从一种本体论模式到另一种本体论模式的历史转变,常常伴随着‘技术系统的突变’,但不一定是由其引发的”,任克安(Kippnes, 2017: 232)认为,中国的传统本体论图式,即“类比”在新中国和现代性模式影响下,有朝向与自然主义结合的趋势。

40. 毕明安(Beaney, 2021, 2024)认为维特根斯坦的“seeing as”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庄子的“鱼之乐”和墨子的类比方法的逻辑,即关联性视角论。“一目了然演示”是 seeing as 的另一说法。

41. 《说文·丸部》:“執,种也。”

会空间、地点、场所等概念是传统社会科学中接近本文所称之“地势”的现实存在。与本文聚焦的政治一样,传统社会科学也经常从政治、法律或政治—经济等视角去看待“空间问题”。例如,当代社会学会处理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如从法律规范的土地权和政治—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等角度来处理土地—空间问题;具有政治—经济背景的地理学会区分均质空间(自由主义)和非均质空间及平衡与不平衡地理学(哈维,2006);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涂尔干、莫斯和哈布瓦赫等学者的核心概念,如社会形态学(morphology),也是在处理与“地势”相近的社会、宗教、道德和法律现象。但莫斯的社会形态学则不含汉语“势”所具有的变和动的意思,更不可能将其看作像地势实在那样与天人合一的天道原则有关。而且,在一般的经验论前提下谈论社会形态学和均质/非均质空间,会将这些概念置于命题逻辑的因果关系论中。莫斯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形态学研究就是将道德、法律和宗教视为由物质基础所决定的“功能”(毛斯,2003:394)。同时,功能在此是一种被物理环境(通过社会环境和技术的中介)所决定的“结果”。

传统社会科学视角如何遮蔽“地势”还能以法学为例进行说明。有西方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空间都被视为固定背景,似乎法律的规范总有相应的同质或绝对空间使其安顿;⁴²社会科学还预设空间本身要么是自然给定,要么是由自由行动之人的能动性所创造(Blank and Rosen-Zvi,2010)。在此背景下,一个以个人权利—法律为本的社会,会以相应法律(例如产权法)“格式化”⁴³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空间问题。就此而言,即使生活中有“地势”问题,它也不会直接进入法律

42. “将法律特征与地理环境相联系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所首先阐发。但近代以来,在现代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法律中,法律是一种可以去地域化的规范原则,或者说,在以个人权利为本的法律中,空间(包括时间)被假设作为一种可以均质化的框架,在这种均质时空中可以任由抽象的(个人)主体的理性驰骋。中国当代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样的时空观为依据制定的。本世纪初的集体林权改革和草场承包都是这种法律时空观念的体现。依照这种与抽象个体(也是均质的个体)相对应的均质时空观念,普天之下的森林和草原本质上都是可以均等地分割为个人所有的。大卫·哈维将这种征服和控制的企图称为‘启蒙运动规划的时间和空间’。他指出:‘征服和控制空间’,首先要求把它看作是有用的、有延展性的,因此能够通过人类行动进行支配的某种东西。透视法学说和数学制图法这么做靠的是把空间在特质方面看作抽象的、同质的和普遍的,是一种稳定的和可以认识的思考和行动的框架。”(朱晓阳,2009:60)

43. 关于法律“格式化”社会,参见苏力,2010。

的视野。⁴⁴事实上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合法的业主或“钉子户”不会担忧开发商或政府会通过法律而以“多数人利益”或“人多势众”为理由将其房子拆掉。法律规范似乎正对应着个人权利平等的同质(观念性)空间背景,⁴⁵法律规范一般也能维护个人的权益及其相应的空间。当然,这种法律与空间相对应的预设并不是全部的现实,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法律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之说(De Villiers, 2016)。如果说此前法律研究的主流认为“法律形塑和影响生活的空间”⁴⁶,那么此后,“空间如何塑造法律”则作为问题进入该领域。更接近本文核心概念“势”的“社会空间”一词自此进入西方的法律研究,法律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被认为是辩证和互动的。但是,通过法律形塑空间的“法治”社会格局并没有改变。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建设都以学习和植入外来法律为主。直到21世纪初,国内学界对空间与法律关系的理解总体上仍然停留在西方法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状况。最近一些年,“空间转向”之说开始在法学领域出现(谭俊,2017;韩宝,2019),但在法律实践中,空间仍然被视为法律的固定背景,“地势”更仅在法律视野之外的“潜规则”层面存在,其作为“行动之法”与“书本之法”间的隔膜更大。而相比西方通过法律形塑空间的社会事实存在,“地势”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实事”。简言之,在中国,“地势”之所以显得非常要紧,一个原因就是现代性法律对社会生活之“形塑”的缺乏。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将“地势”从传统社会科学(包括法学)

44. 例如在美国,关于“书本上的法”(law in the books 或 law on the books)和“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之区别的“差距研究”(gap studies)以及后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法律”(law in everyday life)研究成为法律与社会运动的重点(刘思达,2016:20-33)。但这些都不是本文意义上的“地势”研究。

45. 哈维(2004:317)转述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能够达到把空间同质化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在整体上的‘粉碎’和分裂成可以自由转让的私有财产的各个部分,以在市场上任意地买卖”。

46. 法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空间。首先,它可以明确禁止或授权某些空间形态;其次,它可以激励或阻止各种空间形态;最后,它可以将确切的空间配置留给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和群体。其做法或是将区域设置为在空间上不受管制,或是以“法律”生产空间,如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项目,它是由法律规定的一系列政府经济激励措施所构建的,这些措施包括土地补贴、抵押贷款补贴、税收减免和增加公共服务预算等(Blank and Rosen-Zvi, 2010)。

视角看不见之处显露出来。

下文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个人权利—法律为本的产权法并没有“格式化”实际的土地占有。笔者二十多年前在滇池东岸的一个村庄做调查时发现,地方话说中的“土地权”与国家法之间有差距,例如,1992年、1995年、1996年和2004年版村规民约在开篇都写着:“土地是国家的,属集体所有管理使用,农户不允许在承包的土地上取土、建房、挪作他用,违反者后果自负”。⁴⁷从产权排他性立场来看,一宗土地不可能既是“国家的”又“属于集体所有”。从村规民约制定者的视角出发,将“国家”和“集体”以类似性排列在一起,虽然呈现了多重主体关系的土地所有权,但并不矛盾,反而是一种现实的生活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将“农户—集体(村)—国家”与土地的占有关系按照差序排列而成的。

村规民约关于多重关系土地权的描述以类似性为认识形式。这种土地权逻辑有实在基础,是农民实际看到的情形。⁴⁸在空间政治实践中,土地法中关于集体土地的权属规定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规范,实际有效的方式是当事各方利用村规民约中的多重关系土地权表述,通过博弈改变空间优/劣势,进而达到自己的诉求和目标。例如,征地拆迁一方(地方政府)会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由,要求村干部和村民放弃基于土地权利的不服从,村民则会以“建设理想家园”为由(如后文所述),争取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

不过,“地势”虽为“实事”,但并不意味着坚持这种进路就是在坚持中国的社会科学理想。相反,“地势”或“势说”政治的缺陷是其对当代政治中一些必需的“确定性”的漠视。例如,在当代社会政治实践中,它会与无视法律确认(产权和个人权利)等关联。因此,需要将“势说”政治与“通过法律形塑”相结合,走向一种能充分认识“势说”政治作用的法治社会。

47. 2004年版的村规民约的第一条是“每个村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认真遵守国家法律……”,第二条才是上述内容。此后几年,该地实行村改居,不再制定村规民约,因而2004年版村规民约是最后一版。

48. 从认识论来看,这种土地权的多重状况有点像一幅“鸭兔头图”。当代语言现象学对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09: 204)的这个例子的理解是认为存在“看作”(seeing as)的关联性非命题视角论,而不仅仅是命题逻辑意义上的“视为”(seeing that)。

(四)“地势”话说作为实在和行动

从笔者过去收集的城市化研究案例来看,基层的实践者(包括村民/业主、政府官员和开发商)都认识到了“地势”是实在问题(朱晓阳,2011)。与这些实践者相比,社会科学领域更多从政治和经济等视角去预设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却往往对地势视而不见。笔者也是在过去多年从事草原承包、集体林改革和城中村改造等应用研究中,逐渐与地方志作者的视域重合,认识到“地势”话说的实在和重要性。例如,笔者在对滇池东岸传统家宅住居历史和栖居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场所的“地势”意义是由家宅形制、亲属关系实践和住居者的体验等演成的(朱晓阳,2021a)。在这些场所,“地势”政治的日常用语是“家园”或“建设理想家园”,而不是土地法所表述的土地所有权利。

但家园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是以“身家”为核心的“地势”政治的起点和基石(朱晓阳,2012:115-147)。也就是说,若仅看到“理想家园”是农民宇宙观的体现,就无法解释城市更新中人们的行动。同时,若以传统社会科学的方式在村落层面寻找村民行动和事件的因果链条,也无法解释清楚整个事件的过程和走向。因此,可行的分析路径是将“理想家园”当作无法还原的“本体”,将其他发生在不同层次的事件、行动和解释等都与此本体性“场所”联系起来(朱晓阳,2012:115-147)。这些事件、行动和解释与本文提到的“中间性链接”相似。

“地势”话说往往表示行为或“以言行事”,例如日常语言述说中的“我们顺势而为”“保护家园、建设家园”等。这些述说表明的是正在进行的行为或“话语驱动的行为”⁴⁹,而非已经存在的事实,它关涉本体性或兵法“地势”的演成。再如“造势”“以地谋势”“人多势众”等“势说”也是“以言行事”⁵⁰,即行为。从日常语言哲学意义上说,“势/地势”话说

49. 在此可以用哈贝马斯关于其交往行动理论形成的概述为例。哈贝马斯(2023:140)认为,其理论是互动论基础上的“以言行事”,后来因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蒯因和戴维森的影响走向“实在论”的语言本体论,“以诠释学方式进入一个由符号赋予结构的生活世界的对象领域”。哈贝马斯关于以言行事与交往理性的讨论,有力地论证了日常语言情景下人们如何以交往对话导向规范和行动,商谈如何与“真”联系。哈贝马斯对其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来源的梳理展示了这个领域的社会学核心问题(包括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如何与日常语言哲学建立直接关联。

50. 有关“以言行事”,参见奥斯汀(2012)的《如何以言行事》。奥斯汀式的日常语言哲学很接近本文的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主张。

使听话者获得理解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如“顺势而为”。这是“势”话能产生的效果,是其他因果推断或基于统计学的因果论断或论说都不蕴含的行动作用。例如,前述毛泽东对井冈山的“地势”述说,虽然有“走遍了罗霄山冈”作为基础,但并不是基于实证科学的因果推断,也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判断,而是对整个地区“地势”与其他中间条件相联系的体验和观察。⁵¹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对“地势”的把握及相应行动产生了符合预期的效果。人类学家斯特拉森(Strathern, 2022)在论述メラ尼西亚“看”的视角论时称“看是一种活动”⁵²,这与本文的观点“地势话说是以言行事”相似。

与“地势”话说的本体性和“以言行事”的双重性相关,“地势”民族志应当是一种“积极行动人类学”(Ortner, 2016: 47-73)。“地势”政治民族志聚合“解释”和“改变”双重目标,其调查和“抒写”经常通过“参与”与“合作”推进,具有“行动研究取向”。

可以将与政治生活有关的“地势”分为两种:兵法之“地势”和本体之“地势”。兵法之“地势”即以地势、局势和人势等空间格局为进退取舍的根本考量,换句话说,这里的法即“兵法”,《孙子兵法》《韩非子》⁵³和《荀子》的“地势”论说均属于这一类,法国学者余莲关于“势”的论说也近于兵法之“势”,即非“本体”的公设。本体之“地势”是一种日常语言视角的“实在/本体”,是一种凝聚精神和物质的现实。它包含人的世界感知、情感和地方认同,而不仅仅是政治谋略性空间布局。此外,虽然汉语中“势”的语义、语用未必单一,但其较为明显的特征是用以判断各种“势”的视角具有某种整体性和实在性。⁵⁴《周易》的“地势坤”在日常

51. 如用维特根斯坦评论《金枝》的话来说,毛泽东的“地势”述说是“综观/一目了然式表达”,“这种综观表达传达了一种理解,即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联系’”(Wittgenstein, 2018: 46-48)。

52. 斯特拉森(Strathern, 2022)称:“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观者的观看成为制作人工制品的‘工作’的一部分。”

53. 《韩非子·难势》中也区分两种势:一是自然之势,二是“人之所设”。韩非子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又言:“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再曰:“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

54. 此处吸收了匿名评审的观点:“这类整体结构性与心理学中耳熟能详的格(转下页)

语言⁵⁵使用中就有本体意味,即“地势柔顺”之意(黄寿祺、张善文,2008:18)。⁵⁶相比之下,老子的“道生之、物形之、势成之”和荀子的“地势”话说都会强调“道”和“德”相对于“地势”来说是更根本性的要素。⁵⁷当然,这三种成分之间也可以视为类比关系,而不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总之,应当将“地势”当作一种非还原论下综观/一目了然式表达的概念,对“地势”的演示应当如毛泽东那样放在多种条件因素中进行。

三、“地势”作为方法

本节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从日常语言视角而非传统社会学进路出发,将“地势”作为方法?实际上,作为方法的“地势”本身也存在如何“把握”的问题。这里使用“把握”一词是强调“地势”方法与因果推断前提下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之间有视角差异。

(接上页)式塔(gestalt)有何关系,不同在哪里?此文的重要特色之一应该是在政治学地势层面反心理层面的主观相对性。”

55. 之所以如此强调日常语言,特别是语用视角,是因为对“地势坤”的文献解释常将三个字分开作“地”“势”“坤”解释。但是在日常语言中,“地势”作为一个词使用很平常并有其意义,引用“地势坤”并不将“地”和“势”分开解。例如,使用日常语言的小说如《西游记》(第67回)载:“你这贵处,地势清平,又许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史记·高祖本纪》有“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张衡的《南都赋》中有句:“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清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

56. 清人王夫之称“是故大智者以理为势”,主张“理势相依,理势相成”,称“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至当篇》);“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绪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违阻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离理无势”“理外无势”(《尚书引义·武成》)。由此可见,金岳霖的“理有固然”似来自王夫之。

57. 《荀子·王霸》:“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孟子的道势说也主张“道势分离”和“道高于势”,如“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根据以上关于“地势”作为进路的讨论,我们首先从“势无必至”着眼来把握“地势”。在此前提下,对“地势”的把握和描述会涉及从中国天道观原则作出的说明。其次,“地势”话说(包括“地势”民族志)作为方法与行动研究密切相关,或可称“行动即方法”。简言之,“地势”政治的方法论核心是如何把握“地势”和演成事实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地势”作为方法论在实用工具层面与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并无根本区别。在此可以套用戴维森关于心理事件分析的说法,即“势/地势”论说与一般社会科学进路/方法在事实层面相同,或属于“变异一元论”,两者区别只是互相不能还原的两种规范性描述。如上所述,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在“势说”与因果/逻辑斯中心观念比较的层面,或者说范式层面之上。但是与“变异一元论”的反相对主义预设不一样,“势说/地势”进路强调语言述说视角差异与生活形式或“实在”差异相关。因此,用何种话语来描述现实显得十分关键。

(一)如何把握日常语言视角的“地势”

作为方法论工具,把握“地势”首先离不开“物”,用《老子》的话说,即“物形之,势成之”。在具体的“地势”方法使用上,强调地形、节点、场所或穴等自然或社会性空间。如何识别形成“势”之“物”,则需要察看“地势”。具体方法其实包括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社区空间调查、历史事件、谱系树形图绘制、口述史、社会调查,等等。此外,风水堪舆等也是把握“地势”的方法。

值得提出的一种方法是“测度”(mapping)。首先,因为测度是在空间和场所研究中被应用较多的方法(林叶,2020);其次,测度既可以用一般社会科学的经验—诠释进路描绘,也能够与“势说”话语相互融贯。一般认为,“测度”与受现象学影响的人类学关系较为紧密。例如,蒂姆·因戈尔德(Ingold,2000:219-242)曾讨论过测度作为栖居进路下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规划和建筑学领域,测度受到重视并被开发成了操作工具。简言之,测度具有从多重交互视角或以“异形”(heteronomic)概括⁵⁸(Davidson,1992:146)把握当地世界的特征。上文提到的毛泽东的“地势”分析案例,正是测度方法的体现,他把握井冈山地势的基本工具是用脚测度,“整个罗霄山脉都走遍了”。

在笔者过去多年的实践中,简略版的测度常以三个步骤进行:正规

58. “异形概括”与维特根斯坦所称的“综观/一目了然式演示”有相似之处。

地图、当地人绘图和“找路”过程。虽然在现象学影响下,一般会认为测度应当从与个人感知切近处开始,但在社会和政治研究中,“测度”往往是从一张标准地图或卫星地图开始的。这些图常常是正式地图,代表了制图当时的官方规范,其投影和标识是制图所代表的官方关于空间的正式知识。在人类学中,这种地图往往被认为与当地人眼中的地方地图之间有着“视角”差别。⁵⁹所谓测度的第一步就是用正式地图作为起点,通过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得到一幅他们感知的地图。这个过程可以用社区发展中的一项工具——社区绘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所谓社区绘图就是和当地人一起绘制出内含地方标识的地方地图。从研究者角度来看,测度过程犹如找路(Ingold, 2000: 219-242),即在当地人的引导下在社区实地行走。例如,在社区发展项目中,研究者一般是从当地的区域范围内做对角线穿越,在行走过程中,当地人自然会将其图绘中的标识以故事讲出,测度自然也是在时间中的运动(在图上或真实世界中)。测度不是一次性的对照地图所进行的查找,而是开放和持续的。在今天,我们能够用有历史时间追溯功能的卫星图(例如谷歌地球)测度一个地区在过去几十年的变迁,这些变化的地点会引出当地人的“故事”和更多的地图。测度实际上有些像摸着石头过河。按因戈尔德(Ingold, 2000: 219-242)的看法,测度更像是一种故事讲述,因为“当地人不一定知道一统的(如同钟点时间一样的)‘空间’中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是能够用包含历史的‘位置’或‘地区’(region)——一种矩阵去描述”。

上文仅仅从依据地图和绘制地图的角度谈测度,实际上,测度可以当作综观/一目了然呈现“地势”的方法。就此而言,“测度”混搭和凑集了诸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成分,例如,人类学中亲属关系谱系树形图的绘制和对一个人/家庭/社区的生活历史的探究。“测度”的混搭特征也体现出它确实有与“一目了然”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 2018: 90; Wittgenstein, 2018: 46-48)。整体而言,测度不是因果推断式解释,并且演示测度的不同成分之间互相不需要还原,也不能还原。

测度的意义在于:其一,能够发现当地人的世界,是进入“土著”世界或生活形式的路径,例如,“讲故事”(生活史和口述史)不仅能测度到

59. 这里仍可以斯特拉森(Strathern, 2022)关于“看”在西方摄影家、人类学民族志作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别为例。

有形之物,还能测度到当地的“无形之物”;⁶⁰其二,通过测度,可以发现当地的关键场所、节点和地方的规范等,简言之,可以通过测度把握当地的“地势”,进而研判地方的社会政治格局及其趋势。

在“测度”之外,“地势”方法与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往往也互相兼容。例如,社会调查总是不可或缺,适时数“人头”、数房子是把握势/地势变化的必需,而地方的社会经济数据也总是不可或缺的。又如对当地人行踪的时间—地理学调查以及近年来通过大数据等开展的行迹或人员聚集/流动研究等方法也很必要。

此外,把握和研判地势需要直觉、想象和洞察,这似乎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说法,因为人们一般会以“地势”话说为“非科学”而不进行追究。但若说社会科学研究也离不开直觉、想象和洞察时,往往会受到实证科学拥趸的质疑。

如前所述,对“地势”的把握和描述会涉及中国的天道观原则。在把握和研判“地势”时,对特定场所“无形之物”的想象和洞察应当纳入方法工具箱。换句话说,对这些地方的认识应当有与天道观原则相融的元素及其说明。例如,将“气”“脉”和“穴”等作为“地势”研判的必要概念,因为这些语汇是在“势说”视角下相互融贯一致的⁶¹,即都在势一道/理原则的框架之中,是与实证方法和诠释方法不同视角下的实在。当以“地势”方法研判一处场所时,将“气”“脉”和“穴”的测度与描述作为对实在现象的把握,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总而言之,在实地调查层面,“地势”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方法或工具互相兼容,或者说这些不同的实用工具概念是以“中间性链接”放在一起。而二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则有不同的视角,或者说属于不同的“范式”。“地势”方法论有“势无必至”式的“地势”把握和风水堪舆等方法,社会科学的动因说则有自然逻辑空间(因果空间)和理由逻辑空间二分下的说明—理解两种社会学模式,假设验证和概念建构则是这种范式下的更具体的方法论。

(二)“地势”话说行为即方法

上文提到“地势”话说往往表示行为,例如日常语言述说中的“我们

60. 例如,以当代具身化和可穿戴的影音技术为工具可以测度(宗教、法律生活)的日常语言形式。具体案例可见朱晓阳,2023。

61. 本文在此借用了戴维森(2008:453)对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相变异的讨论方式。

顺势而行”等话语表明的是正在进行的行为,而非已经存在的事实,也不是科学因果推断意义上的条件具备。从“势无必至”的话说看,重要的是处于有利的“地势”和顺“势”而为。例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是以“地势”导向行动,即使无因果推断作为支撑,把握“地势”和顺“势”而为也会有实效。在此,“势说”话说、物、行动共同演成实在的“地势”或兵法上的有利“地势”。与人类学的“行动研究”或“积极行动人类学”有关,在人类学介入活动中,“势说”话说与行动为一体。因此,可以说,“势说”话说行为也是“地势”研究方法。

四、结语

“地势”是政治实践的方法,特别是在与空间有关的政治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方法。本文将“地势”问题放置在更宽的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讨论,因而从一些根本性问题开始论述。

二十余年前,政治人类学流行的一个发问是“如何不以西方‘政治学’为出发点”,本文基于这些讨论提出政治生活中的“势”话说蕴含着一种选择途径,进而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入手讨论“势说”政治进路。本文的讨论是在与西方社会科学一般进路对话的基础上,特别利用当代语言人类学的田野发现和文学翻译的“田野”经验作为支持。长期以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讨论要么是以理想语言作为例子,要么是局限在同一种语言传统内,很少用跨文化范式的日常语言作为案例。因此,当代语言人类学和跨文化范式诗歌翻译的“田野”发现和经历应当成为讨论日常语言视角差异的一手资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清楚学界争论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问题的意义。

从日常语言述说或话说视角来看,“地势”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实事,但是在传统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下,这个实在问题被“格式化”成了其他社会科学问题,其生死攸关的意义被遮蔽了。从日常语言视角提出“地势”问题,其要旨是让人注意到它对社会生活及人们行为的意义。此外,“地势”作为进路和方法是以因果推断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进路不能化约和替代的一种理论和实践视角。就实践面向而言,“地势”视角为行动者提供了因果推断所没有的整体论和行动效果承诺。

不过,“地势”虽为实事,但并不意味着坚持它就是社会科学的理想。相反,“地势”或“势说”政治的缺陷是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必需

的“确定性”的漠视,例如,它与无视法律确认(产权)相关。因此,社会科学需要将“势说”政治与“通过法律形塑”相结合,走向一种充分认识到“势说”政治之意义的法治社会。简言之,这里也需要发现一种非还原论的“中间链接”。

本文在将“地势”作为政治人类学的进路进行讨论后,进一步对“地势”作为实地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虽然“势说”政治或“地势”话说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本体论和知识论的根本预设上有区别,但是在田野调查层面,多种范式是相互兼容的。本文以“测度”方法为例,对“地势”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讨论,发现测度既联系“地势”话说和社会科学知识论,又嵌入于田野调查操作技术之中,具有一种“一目了然显现”的特性。简言之,我们在对待“地势”这类中国政治学中近在眼前的演示概念时,应当避免将它们视为“原点”,而应专注于发现它们与其他事实之间的“中间链接”。此外,“地势”话说往往是一种行为。本文在此前提下,主张“地势”话说行为即方法,但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仍有待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埃弗里特,丹尼尔.2019.别睡,这里有蛇:一个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亚马孙丛林深处[M].潘丽君,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埃弗里特,丹尼尔.2020.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M].何文忠、樊子瑶、桂世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奥斯特,约翰·兰肖.2012.如何以言行事[M].杨玉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伯恩斯坦,理查德.2008.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M].黄瑞琪,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陈寅恪.201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戴维森,唐纳德.2008.真理、意义与方法[M].牟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丁鹏.2021.因果推断——现代统计的思想飞跃[J].数学文化(2):51-67.
- 费孝通.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16.
- 福蒂斯,迈那、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2016.非洲的政治制度[M].刘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哈贝马斯,尤尔根.2023.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M].童世骏、应奇、郑宁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哈维,大卫.2004.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哈维,大卫.2006.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海德格尔,马丁.2004.在通往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马丁.2018.思的经验[M].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韩宝.2019.理解法律地理学——关于法学的一种空间思考[J].交大法学(1):51-72.
- 胡治洪、丁四新.2006.辨异观同论中西——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中国哲学史(4):112-119.

- 黄寿祺、张善文.2008.周易译注(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金岳霖.2010.论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林叶.2020.“废墟”上的栖居——拆迁遗留地带的测度与空间生产[J].社会学评论(4): 88-103.
- 刘珩.2019.情感的公共与私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J].社会学评论(5):3-14.
- 刘思达.2016.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兼议中国社科学法的未来走向[J].交大法学(1):20-33.
- 毛斯,马塞尔.2003.社会学与人类学[M].余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毛泽东.1951.井冈山的斗争[G]//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穆尔,杰里.D.2009.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李岩,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穆.1996.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萨丕尔,爱德华.2009.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萨林斯,马歇尔.2008.人性的西方幻象[M].赵丙祥,译.新北:群学出版社.
- 尚杰.2010.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 苏力.201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 谭俊.2017.法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法制与社会发展(2):74-86.
-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奇.2018.哲学研究[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奇.2024.论确定性[M].楼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 温奇,彼得.2016.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张庆熊,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沃尔夫,本杰明·李.2012.论语言、思维和现实[M].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向世陵.2019.中国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谢维扬.1995.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余莲,弗朗索瓦.2009.势:中国的效力观[M].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祥龙.2017.海德格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郑宇健.2024.路径意义的回溯式重建——正向偶然性与反向必然性(未刊稿).
- 朱晓阳.2009.林权与地志[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1-72.
- 朱晓阳.2011.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M].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朱晓阳.2012.物的城市化与神的战争[J].法律和科学(2):115-147.
- 朱晓阳.2016.地势与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朱晓阳.2020.日常语言视角下的社会学本土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7-22).
- 朱晓阳.2021a.基层社会空间的法:社会形态、兵法和地势[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3): 1-17.
- 朱晓阳.2021b.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J].社会学研究(1):46-68.
- 朱晓阳.2023.“家人世界”: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语言形式[J].社会43(6):1-25.
- 朱晓阳、林叶.2025.“一目了然”看世界——“综观”进路与社会学方法论(未刊稿).
- 朱熹.1986.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
- 左才.2017.政治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四种不同的理解视角[J].国外理论动态(1):24-31.
- Austin, John Langshaw.1956.“A Plea for Excuses: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57: 1-30.
- Beaney, Michael.2021.“Swimming Happily In Chinese Logic.”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21(3): 355-379.
- Beaney, Michael.2024.“Getting to Know Knowing-as as Knowing”(unpublished).
- Bernstein, Richard J.1978.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lank, Yishai and Issi Rosen-Zvi.2010.“The Spatial Turn in Legal Theory.” *Hagar: Studies*

- in Culture, Polity & Identity* (10): 37–60.
- Davidson, Donald. 1992. "Mental Event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Problems/Contemporary Issues*, edited by Brian P. Beakley & Peter Julian Ludlow. MA: The MIT Press: 137–150.
- Davidson, Donald. 2001.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3–198.
- De Castro, Eduardo Viveiros. 2004.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i: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2(1).
- De Castro, Eduardo Viveiros. 2015. "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Some Comments on an Ongoing Anthropological Debate."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 2–17.
- De la Cadena, Marisol. 2010.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2): 334–370.
- De Villiers, Isolde. 2016. "Leibniz, Lefebvre and the Spatial Turn in Law." *HTS Theological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72(1).
- Descola, Philippe. 2013.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vans, Nicholas. 2010. *Dying Words: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hat They Have to Tell Us*.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A John Wiley & Sons, Ltd.
- Geertz, Clifford. 1965.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Cambridge: M.I.T.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83.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s Press: 55–70.
- Giere, Ronald N. 2006.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ledhill, John. 2000.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Pluto Press.
- 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2017.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i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 Kohn, Eduardo. 2015. "Anthropology of Ontolog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 311–327.
- Keesing, Roger Martin. 1974. "Theories of Cultur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73–97.
- Kipnis, Andrew B. 2017. "Governing the Souls of Chinese Modernit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2): 217–238.
- Lee, Timothy B. and Trott Sean. 2023. "Large Language Models, Explained with a Minimum of Math and Jargon." *Understanding AI*. <https://www.understandingai.org/p/large-language-models-explained-with>.
- Mackie, John Leslie. 1965. "Causes and Conditions." *American Philosophy of Quarterly* 12: 245–264.
- May, Reinhard. 1996. *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 translated by Graham Park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Dowell, John. 1994. *Mind and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tner, Sherry B.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1): 47–73.
- Paleček, Martin and Mark Risjord. 2013. "Relativism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within

-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3(1): 3–23.
- Putnam, Hilary. 2002. *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lmond, Amiria J.M. 2014. “Transforming Translations (Part 2): Addressing Ontological Alterit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 155–187.
- Shinner, Quentin. 1979. “Review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by Richard J. Bernstein.” *History and Theory* 18(2): 234–240.
- Strathern, Marilyn. 2022. *Learning to See in Melanesia*. Chicago: Hau Books.
- Wittgenstein, Ludwin. 1967.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 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 edited by Cyril Barret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ttgenstein, Ludwig. 200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translated by Gertrude Anscombe, Peter 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UK: Wiley Blackwell.
- Wittgenstein, Ludwig. 2018. *The Mythology in Our Language: Remarks on Frazer’s Golden Bough*, edited by Giovanni da Col and Stephan Palmié, translated by Stephan Palmié. Chicago: Hau Books.

责任编辑:田青
实习编辑:郭琦